

# 发现古谱中的神韵和魅力

李宏锋

## 传承之光

### 核心阅读

器乐艺术较早独立觉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记音成谱”的书写传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一大突出贡献。

传统乐谱中的“模糊记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兴创作空间。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传承的高度重视。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留声机发明之前,人们若要留住美妙的乐声,除了口耳相传,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将音乐书写下来。纵观人类发展史,很早就能够掌握记录音乐能力的文明寥寥无几。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陈列着多件音乐珍稀典籍和乐谱文献。这些初看“天书”的文献,以其独特方式,诉说着中国音乐的悠远历史和令人神往的流风遗韵。

### “因器定音,记音成谱”古谱记载的不仅是音律,还包含乐器音位和演奏方式

创设一套可行的符号与书写规则,将音乐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乐谱。音乐“文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则统称为“记谱法”。

乐器作为音响的制造者和承载者,自然成为许多记谱法的天然凭借。中国传统乐器和器乐文化源远流长,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算起,已有八九千年历史。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表明,中国的器乐文化至迟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器乐艺术较早独立觉醒,使得中国传统乐谱不仅早早成熟,形成“因器定音,记音成谱”的书写传统,而且种类繁多,成为中国音乐对世界音乐文明的一大突出贡献。

历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音乐,记谱法各异,创造出的乐谱千姿百态。根据符号内涵和记谱规则的不同,可以把这些乐谱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音律型曲谱,用文字或符号描述音高。较常见的如宫商谱、律吕谱和

各类腔势谱。宫商谱使用“宫商角徵羽”等阶名记写音高,律吕谱则采用十二个律吕名记录旋律。十二律吕名最早见于《国语》,人们常用“黄钟大吕”形容音乐或言辞的庄严高妙,“黄钟”“大吕”就是十二律开头的两个律名。

二是音位型曲谱,以各类符号指代乐器上的音位。使用这类曲谱,必须首先明确乐器的定弦、定品方式,管乐器的开孔标准和按孔、吹奏方法,才能确定每个音位的实际音高。正因如此,音位谱往往与乐曲宫调密切相关。同一份谱子,换用不同宫调演奏,音响大不相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一份五代时期的曲谱,采用20个琵琶音位符号记录,是目前已知这类曲谱的早期代表。

音位型曲谱中的“俗字谱”和“工尺谱”比较特殊。宋元以后,这两种乐谱广泛应用于戏曲和器乐表演,谱字符号被赋予了相对固定的音高内涵,成为民族音乐中应用最广的谱式之一。

三是奏法型曲谱,符号记录的是不同乐器的演奏手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源远流长的古琴谱,以汉字或其减笔为符号,重点记录演奏动作和指法规范。还有用不同符号或状声字代表不同音色乐器的打击乐演奏谱。

### 口传心授,方得神髓 古谱“非精确性”源于对活态传承的重视

中国传统乐谱的记录特点,与传统音乐的传承、创造方式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的音乐传承,长期以来遵循师徒“口传心授”“耳提面命”的方式,乐谱只是这一过程的辅助工具,是名副其实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或记写音高,或记录手指音位,或描述演奏动作,直接服务于口传心授的基本传承形态。即便对于新创乐曲,乐人也很少自己“按谱寻声”。清代王德晖、徐沆激的《顾误录》特别把“按谱自读”列为“学曲六戒”之一,认为乐者如果无人传授,仅靠自己按谱唱奏,很难得其神髓。

由此看来,传统乐谱中的“模糊记录”,绝非有意为表演者提供二度即兴创作空间。其“非精确性”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是对音乐活态传承的高度重视。那些只能“心领神会”的声音表现,正是音乐神韵的精妙所在。即便在拥

有高科技手段的当代,这些也是很难在谱面准确呈现的。

为弥补各类传统记谱法的局限,历史上又出现了谱式的并用与改造。比如,针对工尺谱节奏记写的不足,明末出现了以方格表示节奏的《魏氏乐谱》。古琴减字谱缺乏对旋律的直观表达,便出现了减字谱与工尺谱合用的琴谱,方便演奏者掌握,如清人张鹤的《琴学入门》。

古谱代表着现存中国传统音乐的源头。今天我们听到的很多传统乐曲,都有相应的古谱渊源。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琵琶曲《春江花月夜》,早在1875年前已有古谱传抄本,又以《浔阳琵琶》为名保存在清代李芳园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经后人改编而成此曲。再如琴曲《梅花三弄》,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纂的《神奇秘谱》,经后世琴家打谱演奏,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大量古谱文献记载,这些音乐珍品便永远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中外很多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谱的翻译工作,力求唤醒“沉睡的声音”。以古谱解译为主题的音乐会很早就有举办,影响较大的如1983年的“第二届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演出了自南北朝至清代各时期的代表作品,包括南朝梁丘明传谱的琴曲《碣石调·幽兰》、唐代《秦王破阵乐》等。一些学者致力于恢复将诗词唱出来的“歌诗”传统,如上海音乐学院承担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培养”项目,近年来从古谱中整理出约千首古代诗词歌曲,2019年还举办了“风雅中国:中国古谱诗词音乐会海外巡演”。更多当代音乐人从古谱中汲取养分,创造出古乐风格的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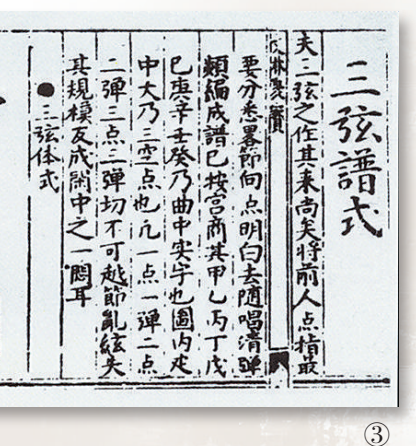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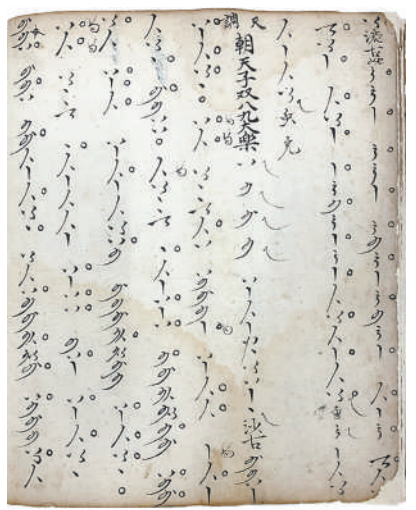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是国内珍稀典籍与乐谱文献的主要收藏地之一,据统计共有近2000种。它们大多是70年来历代学者辛勤收集的结晶,也有一些来自文化名家的捐赠。如明代天韵社昆曲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杨荫浏先生的老师吴晓卿的手抄本,另一个是当年杨先生刻写的油印本。20世纪初,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怀着对传统音乐的无比崇敬与热爱,一笔一画手录昆曲百余出,并油印百部分赠曲友,这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令人动容。

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一份份乐谱文献宛如颗颗明珠,闪烁着璀璨的光

芒,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图①:西安鼓乐何家营乐社抄谱。图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的清代刻本《小慧集》,其中用工尺谱记录的“鲜花调”是民歌《茉莉花》最早的曲谱之一。本报记者 周飞亚摄 图③:明代徐会濂《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的“三弦天千谱”。图①图③为李宏锋供图 版式设计:赵德汝



2022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百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七十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

86岁的考古学家李伯谦在致辞时感慨:“北大考古100年的发展史,我有60多年参与其中。”

李伯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1年毕业留校,开始教书育人,多年带学生田野考古实习,即使后来忙于授课、研究,每年也都会抽空到考古现场。“考古必须以田野发掘为出发点,没有考古的调查、发掘,考古学研究就很难向前推进。”

从昌平雪山文化遗址到偃师二里头再到安阳殷墟,从盘龙城到曲沃曲村,从夏商周到新石器,李伯谦的领域不断延伸。上世纪70年代,江西吴城商代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器物涉及不同文化,李伯谦分析后认为,尽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土著”器物,于是将其单独命名为“吴城文化”,这也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运用。后来,他运用这个方法相继分析了多个遗址。

“田野考古也离不开研究文献。从历史文献中找出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考古学研究来分析问题,这是宿白先生经常教导我们的。”李伯谦说。

北大考古系的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定期在天马曲村遗址进行考古实习,一批批考古学家从这里成长,一件件出土文物充实到各个博物馆,通过考古资料书写了一部鲜活的晋国史。2022年是晋侯墓地发掘30周年,李伯谦对1992年的那次抢救性发掘记忆犹新:“发掘持续到2001年,我们共找到了9组19座大墓,出土了上万件珍贵文物,随葬的青铜器上有多位晋侯的名字,确定其为晋国第二代国君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观众走进今天的晋国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发掘现场。”

因为看过很多遗址出土的青铜器,10多年前,李伯谦和刘绪不怕辛苦、费时费力地组织出版了20卷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为社会留下了一个扎实可用的资料库。

###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用力之处”

今年夏天,《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距离1996年至2000年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过去了20多年。

李伯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这是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当时涉及学科最广、参加人员最多的重大研究项目之一,2000年入选了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公布的三代年表,被各种工具书和教科书采用。

研究并没有因为工程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学术课题。为此,2000年李伯谦主持起草了《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几点设想》,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主持人之一,探讨进一步追溯中华文明源头的考古思路。“当时觉得,我们至少应该把黄帝时代究竟有没有进入文明阶段弄清楚。”

随后启动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预研究”的黄河中游地区扩大到黄河下游和上游、长江上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从文明形成所需的自然环境、生业经济扩大到都邑、聚落、年代、精神的研究,囊括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各个发展阶段。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持续考古,推动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遗址。”

考古学的优势在于,挖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用力之处。我年轻时见过顾颉刚先生,也听过他的演讲。早期历史的保存形成,最初只能是口耳相传,等有了文字,将口述内容书写出来,就成为传说,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谦说。

夏、商王朝曾经也是传说,后来逐渐变为信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果。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持续考古,推动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遗址。”

考古学的优势在于,挖出来的都是真实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点——“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恰恰是考古学可以用力之处。我年轻时见过顾颉刚先生,也听过他的演讲。早期历史的保存形成,最初只能是口耳相传,等有了文字,将口述内容书写出来,就成为传说,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谦说。

夏、商王朝曾经也是传说,后来逐渐变为信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重大成果。登封王城岗遗址的持续考古,推动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谦认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遗址。”

# 考古学家李伯谦——立足田野探文明之源

杨雪梅

常常文破辞碎,而且不会自己说话,需要研究解读才能描述历史。

“史学形成有三个渠道。一是从口耳相传以及古代文献中寻找历史;二是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写历史;三是社会学、人类学兴起后,从人类学资料中寻找历史线索。要获取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必须把三者密切结合起来。”李伯谦说。

###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近几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郑州东赵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南阳黄山遗址以及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与文明探源相关的重要遗址,都可以看到李伯谦的身影。为了研究方便,他索性搬到郑州长住。

“传统史学的三皇时代,大致对应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早、中期,五帝时代大致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末期。从古国到王国再到帝国的三大阶段,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真相。”

什么是“文明”?“文明”达到什么状况、什么程度才算形成?不同研究者会有不同回答,但都有一个自己衡量的标尺。李伯谦认为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最为贴切。

过去西方学术界多以城址、大型礼仪建筑、青铜器、文字作为判定社会已进入国家阶段的标准,后来又以聚落的多级分化作为判定标准。李伯谦一直主张从多个方面讨论聚落等级。

“比如,聚落规模是否出现分化?大型、特大型聚落是否出现大型宗教礼仪活动中心和建筑?墓葬在规模上是否出现分化?是否发现有专门的武器和象征最高权力的权杖、仪仗等器物?是否发现了文字和少数上层人物垄断文字使用的迹象?这些标准都与中国考古遗址现象紧密联系。”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道路及其特点等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李伯谦一直注意总结文明发展对于当下的启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李伯谦始终坚信,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 见证国博与中国考古的共同成长

普博林

在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简称“国博”)创建110周年的众多展览中,“积厚流光——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是一个见证国博与中国考古共同成长的展览。钜鹿宋城出土的青白瓷、山西垣曲商城出土的青铜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秦子铸、“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的外销瓷、大连金远洞的巨鹿驼骨架……240余件代表性文物,围绕一个个具体的考古案例,展示了探寻文明脚步。

1921年,几乎与仰韶遗址的发掘同一时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在河北钜鹿开始了宋代古城发掘。钜鹿古城位于今河北省巨鹿县西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因黄河决口而被淹没。发掘工作引入了地层概念,获得“瓷陶杂器二百余件”。

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成立,开一时风气之先。1995年,航空摄影考古工作小组成立,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的遥感考古机构。

从1992年到1995年,由第一代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对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确认该沉船为一艘元代商船,相关成果为研究元代航海史、造船史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这一发现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后近30年,水下考古队的足迹遍及国内多个水域,发掘了“南海一号”宋代沉船、福建平潭“碗礁一号”清代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等遗址。“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发掘,成为我国水下考古的缩影与典范。

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内蒙古赤峰古城址等区域的航空考古调查工作,

极大地弥补了田野考古的不足。1997年,遥感考古为元上都遗址申遗提供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信息。元上都考古队队员感慨说,从空中俯瞰勘察元上都不到半小时获得的认识,超过了在地面工作近7年对其认识的总和。当时基本夷为平地的遗址,从高空俯视,可以清晰辨认出壮阔的城墙遗存、宫殿的布局、街道的走向,甚至寺庙、道观、天文台等遗存。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合并,组建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也开始向更多区域扩展。2018年,国博考古院成立科技考古研究所,下设民族与边疆地区、田野、科技、环境4个考古研究所,拓展至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及冶金考古、同位素分析等研究领域。

2020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的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是国博最新考古成果的代表。这是一处二里头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冶铜遗址,包含大量矿石、残炉壁、铜渣渣、木炭,还有鼓风管、石锤、石砧等相关遗物,构成了冶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进一步复原早期冶铜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场景提供了丰富资料。这是考古界在中原地区首次揭示出规模如此大、专业化水平如此高的夏商冶铜遗址,为探究早期王朝国家铜礼器和兵器等国之重器的资源来源提供了线索。

看完这个考古成果展,再去看看“古代中国”展,看看贾湖的骨笛、红山的玉龙、半坡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马家窑的彩陶罐等生动诠释“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的珍贵文物,也许就更能体会因何“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

